

北京師範大學

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晚清教育改革之研究

——科举制的废除与新教育的兴起

作者:

刘绍春

导师:

王炳照 教授

系别、年级:

教育系 96 级

学科、专业:

中国教育史

完成日期:

一九九九年五月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師範大學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題目：**晚清教育改革之研究**
——**科举制的废除与新教育的兴起**

作者：刘绍春

导师：王炳照

系别、年级：教育系 96 级

学科、专业：中国教育史

完成日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论文摘要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土壤上应运而生的。自它产生之日起,便以强烈的吸引力、极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强大的社会功能对儒家文化的维护、发展和巩固起到了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作用。科举制不仅与封建文化教育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而且与封建统治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科举制与其说是一种教育制度,毋宁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各王朝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在本质上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封建制度整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打破了,被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中来,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教育在新的社会格局中,愈发显露出其“空疏无用”的弊端。特别是在科举制束缚下,传统教育不论是在知识内容、教学方法还是人才目标上,都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得中国传统的知识观、人才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学知识和实用人才得到社会的重视,新式教育广为提倡,这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教育思想中都可以到充分的反映。

改革传统教育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废科举、兴新学进行的,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科举制的改革经历了由最初的从多方面变革考试内容和科目,即变革八股制,到废除八股制,再到最终废除科举制的过程。期间充满了激烈的争议和斗争。科举制的改革过程始终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下进行的,显示出实用性和急迫性的特征。科举制的废除,对于这样一个影响久远、深广的国家大典而言,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弊病使其在新的局面下既无法适应,也无法进行根本变革;另一方面,紧迫的时局使得科举制度的改革一再加快速度、加大幅度,渐变的改革已远远跟不上社会急速变迁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廷被迫采取了激进的措施,将科举制断然彻底废除。

在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新教育的发展。新教育的兴起和科举制的废除是互为因果的。新教育就是在传统教育不断削弱的过程中逐渐壮大的,同时,新教育的发展又促成传统教育的衰落。就是在这样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实现了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新陈代谢。所以,在科举废除之前,新教育已经有了蓬勃发展之势;在科举废除以后,新教育更以强劲的势头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这在地方上(如湖北)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可以得到鲜明的反映。

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1300多年的科举制,其影响之深、之广是不言而喻的。科举制在废除以后,余绪依然飘散,灵魂依然游荡,对新教育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制约和束缚。所以,科举废除以后,清朝廷采取奖励学堂出身的权宜之计,以鼓励士人入学、促进新教育的发展。但权宜之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新形势、新教育面前,奖励学堂出身的办法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为社会众多有识者反对和批判,终于在民国初期被彻底革除。

以史为鉴,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回眸一百年前这场重大的教育改革,一定会给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带来诸多的思考和启迪。

Abstrac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borned in the soi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feudal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a was compelled into the world-wide trend of Capitalism, which produced great changes in its politics, diplomacy, economic, as well as culture and education . The emptiness and uselessnes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became more obvious. Great changes happen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opinions about knowledge and talents. The society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alents, and new education began to be promoted widely.

The focus of reform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 was on abolish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initiating new schools. This reform process had endured some stages, filled with relapses and complications. The reasons to abolish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ere complicated. On one hand, the evils inherent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made it can not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s and carry on essencial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face of emergent social demand, gradual reform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had become out of keeping with the ripid social transform.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in mordern times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re were mutually causality between the rising of new education and abolish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which means that new education became stronger contrast to the weaknes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also prompt the decling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t was in this struggle, that educational transform in mordern times can be realised.

Of cour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had existed for 1300 years in Chinese feudalism, had a deep effect on the society. even when it was abolished, it still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s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adopted a temporary policy,— awarding those who had school educatio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But it was not a permanent solution after all. This policy was opposed by many insightful persons, and abolished thoroughly at the beginning of Min Guo.

Standing at the interchange of two centuries, when we look back to this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reform happened one hundred years ago, we can get enlightenment and useful lessons to guide our educational reform today.

目 录

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举制度·····	1
第一章 晚清社会的变局及晚清教育的矛盾·····	11
一、晚清社会的重大变局·····	11
二、晚清教育改革的要求及晚清教育的状况·····	18
第二章 晚清知识观、人才观的演变	
与科举制的废除、新教育的兴起·····	26
一、中国传统的知识观、人才观·····	26
二、洋务派的知识观、人才观·····	32
三、维新派的知识观、人才观·····	40
第三章 废科举——艰难曲折的教育改革历程·····	47
一、晚清废科举的教育改革历程·····	47
二、关于废除科举制度的思考·····	65
第四章 科举制的废除对新教育的影响·····	73
一、新教育的发展·····	73
二、科举制余绪对新教育的影响·····	82
第五章 个案研究——废科举前后湖北省新教育的兴起·····	92
一、晚清湖北书院转向近代学堂的变革·····	94
二、湖北近代学堂的产生和发展·····	98
三、湖北近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	108
余 论：以史为鉴——关于考试的现代思考 ·····	113
文献举要·····	117
后记·····	121

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举制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王朝，使其免遭改朝换代的恶运，实现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中国的封建政治自不必说，即使是文化教育及其相关的制度措施，在整体上也无不是以巩固封建统治为核心。那么，培养和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治术人才，对统治阶级而言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般都比较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唯其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诸多因素始终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极为突出的特色。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始终力图将教育事业置于自己一元化的控制之下。所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云云，如果说体现了教育事业社会地位之崇高，也正是因为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教育事业具有为封建专制服务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教育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始终笼罩在封建专制政治的阴影之中，从未获得过独立的地位，教育始终难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人才的具体要求及人才的培养方式，曾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培养治术人才的根本目的却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官本位”社会。政府官僚作为权力的掌握者和执行者，不仅直接控制着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等领域，而且还控制和干预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使这块本应相对自由、远离功利的领域也都蒙上了“官”的色彩，散发着“官”的气息。文化教育的轻重取舍几乎完全依赖于和封建政治的关系。历史上不乏志士仁人在入仕做官以后得到了施展治国经邦才略的机会，但对于绝大多数士人而言，这并不是求学最直接的目的。古人求学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动力是入仕做官。

“学而优则仕”是封建社会中士人理所当然的人生追求和人间正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¹ 宋真宗以帝王之尊在他的《勤学诗》中鼓励“男儿欲遂生平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目的是非常简洁明了的，毫无羞涩掩饰之态，那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揭破画皮，原来被古人视为清高的读书之举是再也实际不过了，只不过是获得了实际利益的“俗物”，充满了世俗的气味。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读书求学已不是为了获取

¹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真知，而可以堂而皇之、毫不掩饰地把它当作一种攀升获利的工具，由此可以得到“名”与“利”的丰收。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中与仕途紧密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相对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相应的社会管理组织制度是那么的完备，以至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显得过于早熟。而自然科学则由于与封建统治者的“治术”缺少直接的联系，始终像弃儿一样营养不良、倍受歧视，难以发育成熟。当然我们可以说，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程度，在这样简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实环境中，还不可能明确意识到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极端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为踏上此路的士人展示了光明辉煌的前景；科学技术则被视为学识、修身之“末”和“奇技淫巧”而被压抑，不被社会各阶层所重视，从而失去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机会。于是，就更促成了这种“歧视”——“落后”的恶性循环。其根源所在，正如荀子所指出：“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贾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非精于物者也。”¹ 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指被统治阶级所重视的修己治人、精通人伦社会的学问。精于此“道”者，可以入仕做官，做人上人。这就是治“道”者高于治“艺”者之处。所以，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士人“春风得意”的理想人生，而从事科学技术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不会为人们所重视和追逐了。

任何一个社会形成的长期稳定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可以概况为“官文化”），那么，哲学、法律、教育、宗教、风俗及社会的组织管理制度无不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只能是在文化传统的笼罩、浸染下，或演化、发展或停滞、衰颓。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促成了文化传统的成熟、发展和社会的影响。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强化起到重要作用的诸多因素中，科举制应该首当其冲。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酝酿、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科举制度的产生。（而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便以强烈的吸引力、极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强大的社会功能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发展和巩固起到了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结成一体。科举制不仅与封建文化教育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曾对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¹ 《荀子·解蔽篇》。

而且与封建统治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将社会上的贤明之士网罗搜集到统治阶层中来。士子们倾尽时间和心血用于学习儒家经书和钻研考试的技巧，思想和言行都被束缚在正统的封建意识中。社会上任何人，不论是农、工、商、兵，也不论一个人是什么脾气禀性、天赋高低，是否适合读书做官，只要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就必须捧起经书，走科举应试的路。可以说，科举制对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化、巩固发挥了全面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选才的方法和措施。但真正发挥作用、影响较大，而且比较完备成型的选举制度有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三大选士制度。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这三大选士制度，可以看到，它们与中国的封建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科举制与封建政治融为一体，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制度的范畴。科举制与其说是一种教育制度，毋宁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各王朝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在本质上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封建制度整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成三位一体的，正是中国的文官选拔考试制度。”¹ 它使中国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大体稳定地维持着疆域广阔的统一形态。只是到了明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强化，科举制度也日益走向了僵化和腐朽。到了晚清时期，在“欧风美雨”浸染和冲击下，科举制伴随着腐朽、衰败的清王朝的崩溃和瓦解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走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行程，于本世纪初的 1905 年推出了历史舞台。

二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要想深入、客观地认识科举制度，就必须首先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特质有一个系统的了解。这是我们正确认识科举制度的前提。

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既非造物主的赋予，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联的。这里既有地理条件的因素，也有该民族早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农业文明数千年延续与更新的历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

¹ 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版，第 4 页。

第一，从地理环境来看，我们的祖先自古生活于东亚大陆上。这里东南面临茫茫沧海，北部是苍凉、辽阔的大草原，西北横亘漫漫的荒凉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与别国接壤之处，多是环境恶劣、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古代的先民几乎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而内部却是一个不受外来侵扰、便民生活的开阔腹地。从气候上来看，中国主要处于北半球的温带和暖温带，基本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这是一种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中国大陆境内还蕴藏着极其广阔、丰富的土地、河流和林木等资源，“地大物博”确是值得中国古代社会自豪的一个描述。在这个半封闭的疆界里，先民们获得了一个比较安稳、富饶的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环境。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哺育的大片肥沃土地，既为我们的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我国农业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经济型社会。农业生产事关封建统治的稳定、发展和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所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自封建统治阶级，下到平民阶层最为关心的事情。“以农立国”、“重本抑末”、“民以食为天”成为朝廷、民间普遍接受的观念，深入人心；历代帝王都颁发过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劝农令”和措施；设有各种企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祭坛；都把“重本抑末”作为治国的方针大略；中国农具的发明和制作，农书的刊行，都著称于世；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不论是否接受了文化教育，一般都有从实践中得来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农民们最关心、最操心的就是“年景”如何、“收成”好坏；“耕读之家”是农民们对小康生活的美好向往，家中有务农、读书之人，就不愁家族的兴旺。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官僚、士大夫也会为把自己的家庭建设成“耕读之家”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古代中国人的主体——农民大都对土地有强烈、深沉的依赖感。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整年的辛勤劳作使他们可能谋得低级的自给与温饱，维持着他们单一、简约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¹

这里记述了我们的先民“以农为本”的质朴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凭借

¹ 《吕氏春秋·务大》。

着男耕女织的单薄力量顽强地生存着，在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投入了巨量的劳动，也寄托了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亲族关系凝结而成的宗法制社会。这种以原始氏族社会父系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族制系统，延续、存在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有力维护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漫长过程中，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部落组织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式、礼仪、观念，并没有随着原始社会的衰落、阶级社会的兴起而消亡。在这个社会变革过程中，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宗法血缘关系在新的阶级社会中反而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一直延续、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而展开的诸侯、卿大夫、士的统治关系，是以血缘关系织成的权力网络，几乎延伸、覆盖了国家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统治者家族、宗族的势力成为了国家的统治力量，家族、宗族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国家的利益。这种以统治阶级的血缘纽带组成的宗法社会，不可避免地将“家”和“国”融合到一起，形成“家国一体”的局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突出的特色。

宗法制在中国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它与中国农业经济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它是在中国这块农业经济的土壤上产生的，适应并满足了中国农业经济社会的生产结构和生活结构。宗法制中严格的尊卑长幼等级秩序及其一系列相应的礼仪、观念，都对中国的农业经济社会的运行、稳定、发展起到了维护和强化的作用。在中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村社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群，而在每一个村社细胞群中又存在诸多以家族宗族构成的子细胞。由这些血缘关系或远或近的家族、宗族形成的“宗法组织”，“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¹这种社会组织为宗法制、宗法意识顽强的存在、发展、延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宗法制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就是“孝”，敬仰祖先、尊敬和奉养长辈是宗法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正如《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² 宗法制在家族中表现为对祖宗前辈的绝对的敬仰；在国家方面则表现为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大一统，由家族中的“孝亲”发展、推衍为对封建统治者也就是对皇帝的“忠义”。在这种宗法制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统治必然是专制

¹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1页。

² 《中庸》第二十七章、三十章。

主义的。马克思曾指出这些家族式的村社制度塑造了东方的专制主义：

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¹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¹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的、以农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²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如节俭质朴、自强不息、安土重迁、安分守己、自足自得、崇尚经验、尊重传统、热爱自然、注重人伦道德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同时也是复杂的，往往是粗精、善恶、真伪、良莠相混杂。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质，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精致的体现，以至于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有过多被改造的经历，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它在总体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曾为中国封建社会带来许多辉煌的时期。儒家思想是中国特有的，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官方的正统观念，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儒家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设想的。杜维明先生曾指出：“儒家思想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家长为准绳的官僚政治和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密切联系。”³

儒家思想学说虽宏大博杂，但最主要讲的还是不同地位、不同名分的人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这些不同的人应该如何组成一个社会和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简言之，儒家学说最注重的是人伦道德关系以及天人关系，最关心的是“人事”，具有“入世”、“务实”和“实用理性”的特点。在儒家思想中，可以说“仁”是其道德体系的中心，“礼”则是教化体系的中心。

¹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² 参见冯天瑜：《中国古文化的特质》，载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98页。

³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99页。

“仁”和“礼”几乎涵盖了所有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规范和方法。) 不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下层的被统治阶级，“仁”和“礼”都作出了特定的要求，成为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安邦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从而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和推崇。儒家思想虽然特别强调人自身的修养，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儒家的“务实”特点决定了个人的修养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强烈的社会性。儒家的教育思想强调，最理想的人生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即“学而优则仕”。从而，实现对政治的参与，最终实现其安邦济民的理想和抱负。(也就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进入“内圣”的境界，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人生理想。)

在这长期封闭的环境中，与外界很少有沟通和交往，统治阶级的专横、自大逐渐膨胀发展为天下惟我独尊，国家也成为了高高在上、傲视众邦的中华帝国。在统治阶级的头脑中，社会的发展观也不过就是国泰民安，而且不是面向未来的发展观，而是复古的发展观。相信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古已有之，只需向后回顾和追寻罢了。于是，从讲究父兄血缘关系的“孝悌”发展到君臣关系的“忠义”的一系列伦理道德思想便出现了，并且以强烈的宗法色彩在封建社会大行其道，成为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独尊”地位的权威思想意识。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分工和生活的简约、单一，人们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可走。农、工、商等为统治阶级所不齿，皆属于被统治的“劳力者”。在低级水平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一方面，人们耕作于土地，靠天吃饭，他们的眼界、情感、希望等都限制、寄托在这狭小的土地上，温饱有余便是他们求之不得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并不为社会所需要。或者说，小农经济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在与土地打交道的人的头脑意识中（自然也包括依赖土地的统治阶级），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依靠的是勤劳、节俭、经验、务实等。而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捷、高效、灵活等以及由此可能给人们带来的观念上，甚至性格上的改变，都是当时社会所不需要的，甚至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社会上没有为人们成才提供更多的途径和领域，也没有可以展示个人才能，从而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其它机会。只有从政、做官一途(或者作“君师”，总之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统治阶级)，才可能有机会实施自己的理想、抱负，体现出来自己的社会价值。对于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士人而言，“学”和“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能否走上仕途、进入官场，其思维、观念和目标追求，都在于由“学”而至“仕”。)

这是士人最理想、也是最具可能性的出路。读书不只为求“知”，更在于求“达”。可以说这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所承认的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所以，儒家教育始终有一个明显的功利价值取向，从来不热衷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它更强调个人的治学、修养、作为要切实贴近现实人生和社会，要具有实用的社会价值。荀子就认为，凡是与政治无关的学问都是“无用之辨，无急之察，弃而不治。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¹

以选拔治术人才为使命的科举制正是在儒家文化土壤上应运而生的。

三

科举制产生以后对儒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巩固作用，从而最终是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因为，第一，科举制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笼络人才的需要。普天下各路英俊才士奋力向学，竞奔于科场之中，以致于皓首穷经，老死科场而不悔。科举制通过严格的、规范化考试将大批人才源源不断地充实于封建官僚队伍中来，最终将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唐太宗曾望着新科进士鱼贯而晋见，大悦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颇为典型地说明了统治阶级对科举制情有独衷的奥妙所在。第二，科举制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利于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前代的选士制度不同，科举制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重，而是更加注重士人的知识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从而为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贫寒之士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也可以“怀牒自列”，一举成名天下知。对于普通庶民百姓而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神话。这样，科举考试使得士人阶层不断地吐故纳新，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从而，也满足了社会上绝大多数处于平民阶层的人渴望改变自己身份的心理要求，也为他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或一线美好的人生希望和寄托。第三，统一、规范了士人的思想，树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从而，也就统一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直接灌输、传播于全社会。士人的举业要代圣人立言，这使他们的读、思、言、行都以古圣贤为标准，成了统治阶级在社会上最好的代言人和宣传者。封建正统思想意识通过科举考试遍及千家万户，深入男女老幼，使封建正统思想有了最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这对统一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¹ 《荀子·天论篇》。

第四，具有一定的文化普及功能。科举考试给人们带来的功名利禄的诱惑，是封建时代任何求学上进的士子都无法拒绝的。士子们只有通过研习儒家《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才可能走上晋身之路。这一方面激发了社会上普遍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科举制造就了一批绅士阶层。这一阶层除了小部分幸运者有机会入仕做官外，绝大多数仍是在野之士。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屡次科场失意以后，对仕途不再抱有信心，便以设馆授徒为业，终了一生。也有一些人虽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功名头衔，但因畏惧宦海风波，逃避政治祸患以求得保全，便辟而不就，赋闲在籍。少数人在入仕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政坛，也成为赋闲绅士。这些绅士往往就以教书授徒为业，一面传授科举应试技能，一面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客观上成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发挥了普及文化知识的作用。）

科举制自产生以来，就对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指挥棒。致使学校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科举制纠缠在一起，不能确立其独立的地位，处于两难之中。一是如何解决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与单一培养治术人才的矛盾；二是学校教育如何培养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输送给统治阶级。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长期处于协调、矛盾、和谐、冲突的循环往复的状态中，并最终在学校教育附庸于科举制度为依归。科举考试考什么，学校教育就教什么，士子就学什么。由于考试内容是以《四书》、《五经》儒家经典为主，这就造成了士人一心只读圣贤书，研习修己治人之学问。千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士人在科举考试的机器中挣扎消磨，脚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章句。从整体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士人的“知识”是畸形的，人才也是畸形的。只要不能应举做官的知识就不成其为知识，不能读书做官的士人也就不能算作人才。所以，尽管科举考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学习风气的普遍形成，星星点点的偏远村落中也每每有“灯火到晓”的夜读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由“读书做官”利益驱使而形成的畸形的学习热情。不论是学习内容、学习方法，还是学习目的都有极大的局限性。

到了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八股考试制应运而生。这一专制集权政治下的产物，将士人的思想言行牢牢框于儒家学说的模式中。为圣贤作注，代圣人立言，士人已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声音，自然也就丧失了发展前进的创造力。在唐宋时期，科举考试还培育和选拔出来一大批人才，如唐代的陆贽、刘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兄弟、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曾巩、黄庭坚、秦观、柳永、沈括，……。而明清两代则大不相同，从

明朝建立到鸦片战争近五百年间，名登科甲诸公不下数万，其中很难找出几个堪称不朽的人物。而真正成就卓著、名垂青史者，却又往往不在八股科举之列（如李时珍、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不能培育和选拔出真正人才，一个民族知识精英贫乏、衰落至如此程度，国家走向衰败则势在必然了。

到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将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潮流。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特别是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弊病更加充分暴露出来。面临危机紧迫的社会局面，传统教育的内容、方法、人才等都显得那么空疏腐朽，困窘笨拙，无济于事。众多的有识者认识到中国社会急需树立新的知识观和人才观，学习和接受实用的西学，培养新式人才以实行变法，这是摆脱危机、挽救危亡的唯一出路。于是，改革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改革科举制成为了当时社会改革最强烈的呼声。而且，在科举制废除以前，北京和其它一些省份已经开始兴办新式教育了，特别是地方上开设了许多新式学堂，并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新式学堂尽管历经艰辛，曲折反复，但对中央朝廷的科举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科举改革始终是在激烈的争议和艰难的斗争中进行的，大致经历了设置新的科目（算学科、经济特科等）、改革原有的考试内容（废除八股制；考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及四书五经义）、分科递减科举名额直至最后废除科举制度的过程。

科举制度是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急迫形势下废除的。从“新政”（1901年）对科举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废八股，大幅度改革考试内容）到彻底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仅仅四年多时间。这对于一个实行了1300多年、影响深广的国家大典而言，可以说是急剧骤然的变化，在短暂的时间里实现了一个跨世纪的转变。这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科举制的改革为什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法与新式学校教育相协调、合作；朝廷的改革思想主张和措施怎么会发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的转变；在地方上的新式教育发展得并不充分，制度措施远非完备的情况下，国家断然废除了统一的选才制度，对以后整个社会的学校教育、人才选拔任用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也一定会给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带来有益的启迪。

第一章 晚清社会的变局及晚清教育的矛盾

一、晚清社会的重大变局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始以武力进犯中国，使中国人首先领略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威力。进而西方的科技知识以及思想、制度的精神文明也随之侵入古老的中国，并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外来的冲击，政局的危机，社会的动荡，思想意识的嬗变，经济领域新因素的出现等，社会各领域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易。正如清朝重臣李鸿章所言，是“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自然，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革为其背景的。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都已经是根深蒂固，形成了强大的习惯势力。几乎历代都不乏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忧国忧民之士，但是多数改革不仅成效甚微，而且都难以持久，很快就烟消云散，社会又步入了旧轨。不仅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难以触动，即使是社会上微小的改革也很难奏效。整个社会在极其沉重的惰性中缓慢地延续、发展着。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处于严重闭关自守的状态。上自封建统治阶级，下至普通民众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知之甚少，仍然沉睡在“华夏中心”、“四方来朝”、“以夏变夷”的中华帝国的迷梦之中。而19世纪的许多西方国家已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迎来了工业化时代，纷纷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他们贪婪而疯狂地在世界上寻找资本主义扩张市场，争夺殖民地。侵略的矛头开始指向了地大物博而又酣睡未醒的东方大国——中国。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封建统治者奉行的“坚守关闭之局、严分华夷之辩”的外交政策破产。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很快地侵入古老中国，强烈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果没有外来异体因素的刺激，没有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交流、竞争和较量，中国的封建社会仍然要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原地徘徊；人们仍然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中过着悠闲的生活。这虽然是贫穷、低级的生活，但

人们在蒙昧的状态中也能够自得其乐、自我满足。中国封闭的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正是这样缺少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机会，避免了外来因素对整个社会机体的激活，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稳定、漫长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¹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文化的统治下，整个社会缺少内部自我更新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义理”轻“技艺”、“重本抑末”，这导致了科技生产力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因素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发展滞缓。由此，社会经济基础长期处于落后、低级的状态，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教育也就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梁漱溟先生曾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虽然很勤奋、聪明，比任何民族都不弱，但就是再过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不能造飞机上天。这是因为中国人走岔了路，没有往征服利用自然界，获得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这条路上走，走到了另一边去了。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在人伦关系上面去了。² 如果科学技术这一革命性的因素受到轻视和压抑，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是滞缓的。

晚清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正是在外来因素的催化下发生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侵逼，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浸染，中国也被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中来，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离异传统的趋向和因素。在社会变异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天朝帝国傲视众邦的威风消失殆尽，代之以屈辱外交；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生产因素，以往为人们所不齿的科学技术、实业生产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还出现了工商社会的特征，等等。

1.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海外殖民势力的重要目标。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中，中国一直处于天朝帝国的国际地位，“我

¹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²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精品》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36页。